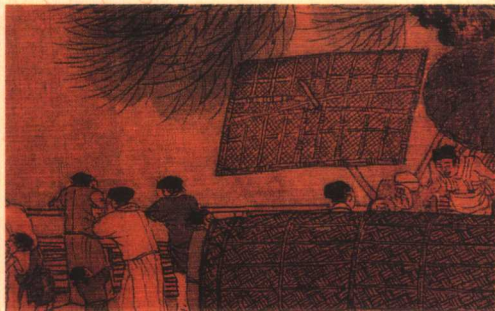


文化史



名家名著

方言与中国文化



(第2版)

周振鹤 游汝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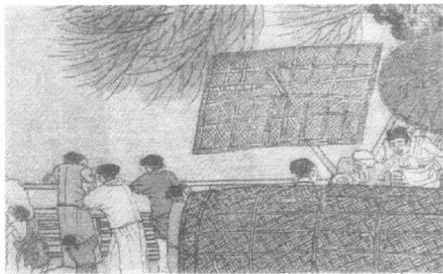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化史



名家名著

方言与中国文化



(第2版)

周振鹤 游汝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言与中国文化/周振鹤,游汝杰著.—2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名家名著)

ISBN 7-208-06207-2

I. 方... II. ①周...②游... III. ①汉语方言—研究②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①H17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0004 号

责任编辑 孙 瑜

封面设计 王小阳

·名家名著·

方言与中国文化

(第2版)

周振鹤 游汝杰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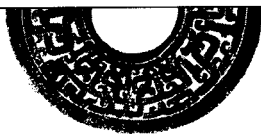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 插页 4 字数 238,000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6207-2/K·1205

定价 27.00 元



第 2 版 序 言

拙著《方言与中国文化》是二十年前的旧作，承学界不弃，曾印刷四次，并于 1988 年由台湾南天书局出版繁体字本，还被译成韩文（译者是全广镇教授和李研周教授），这是著者始料未及的。非常感谢读者、编辑和译者的关爱。

本书第一版第四次印刷（1996 年）其实已是修订版，当时曾对初版作过稍许修订，并增补初版时因故删去的部分。不过全书的格局和基本内容依然如故。这样一来，虽然保留初版本的时代原貌，但是也产生以下两大弊端，一是新的研究心得无法容纳，二是有的内容显得陈旧，如关于汉语方言七大区的分区法。韩文版所据即是 1996 年的修订本。这次重版仅对修订版误植、误用之字、音标和图表再行订正，他无所改。为弥补上述缺失，读者诸君或可参阅著者后出的其他有关论著。

这本书是 1986 年初版的，全书的提要曾在《复旦学报》1985 年第三期上先行发表。“文化语言学”这个学科名称就是在这篇提要里第一次提出来的。当年初衷只是想为中国语言学开辟一块新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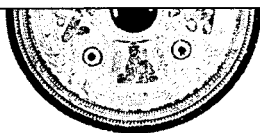
地,以补充中国语言学之不足。但是由于初创阶段只是注重具体问题的研究,疏于理论建设,以致二十年来毁誉参半,为人误解处甚多。

其实,著者所谓“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出发点是:文化因素是造成语言演变和发展的原因之一,或者说,语言的宏观演变和部分微观演变是文化原因造成的。这一见解跟语言相对论并不相同。著者之一曾在中文系执教《文化语言学》课程,后根据讲稿整理而成《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初版,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再版)一书,书中对上述理论出发点有所阐释,该书内容跟《方言与中国文化》并不重复,读者或可参阅。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汉语方言纷繁歧出,地方文化又多姿多彩,所以“方言与中国文化”这个课题,内涵异常丰富,读者眼光幸勿受拙著所述内容所限。与此同时,亦诚恳希望读者对拙著中的错误或不妥之处予以批评指正。

著者谨识

2006年春于上海



目 录

第 2 版序言	(I)
绪论	(1)
第一节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1)
第二节 方言和语言的关系	(3)
第三节 现代中国的语言和方言	(5)
第四节 汉语方言分化的历史背景	(7)
第五节 汉语方言研究史梗概	(8)
第一章 方言与移民	(12)
第一节 移民特征和方言演化的关系	(13)
第二节 移民方式和方言地理分布类型	(28)
第三节 移民与方言渊源和方言地理格局	(37)
第四节 方言学和移民史研究	(42)
第五节 方言的历史层次和移民的历史层次	(46)
第二章 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	(50)
第一节 现代方言区划和历史政区地理	(50)
第二节 汉语方言分区的历史行政地理分析法	(54)
第三节 权威方言和政区中心变易的关系	(61)
第四节 方言地理和交通地理	(62)
第五节 方言地理和城市地理及商业地理	(68)
第三章 历史方言地理的拟测及其文化背景	(71)
第一节 《诗经》时代诸夏语言区域的拟测	(71)
第二节 两汉时代方言区划的拟测	(76)

第三节	西晋时代方言区划的拟测	(80)
第四节	宋金时代方言区划的拟测	(83)
第五节	上海地区明清时代的方言地理	(94)
第四章	语言化石与栽培植物发展史	(99)
第一节	稻的栽培历史和传布	(100)
第二节	麦、玉蜀黍、马铃薯和甘薯	(108)
第三节	从胡豆说起	(110)
第四节	柚子和荸荠	(114)
第五节	箸和粽子、甘蔗和糖	(116)
第六节	茶、辣椒及其他	(118)
第五章	从地名透视文化内涵	(123)
第一节	地名和历史文化景观	(123)
第二节	地名与移民	(128)
第三节	地名和经济史	(133)
第四节	地名和历史交通地理	(135)
第五节	地名和民族史	(137)
第六节	地名和历史民族地理	(139)
第七节	地名层次和文化层次	(146)
第六章	方言和戏曲与小说	(151)
第一节	方言和戏曲研究	(151)
第二节	方言与小说	(168)
第七章	方言与民俗	(173)
第一节	方言和民歌研究	(173)
第二节	方言和地方文化风貌	(179)
第八章	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	(187)
第一节	底层词和底层文化	(187)
第二节	外来文化和汉语外来词	(195)
第三节	汉语外借词和汉文化的西渐	(213)
第四节	域外方言和汉文化的外传	(219)
后 记	(226)
附录:读者来信	(228)



绪 论

第一节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语言似乎是很平常的东西,我们天天说话,处处用语言。只要生理上没有缺陷,小孩子学会说话比学会走路或用筷子吃饭更加自然平易,人们将它用于日常交际,也是不知不觉、毫不费力的。大概很少有人意识到语言乃是我们的祖先世代积累起来的极宝贵的财富。没有语言,人类的社会生活将无法维持,人类的文化创造也无法实现。

那么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语言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谁也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可能的推测是:距今大约四百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开始直立行走,这时候嘴才有可能发出清晰的语音信号,但是它们还不是语言。到距今二百多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也许是由于人类祖先的基因发生了突变,人类获得了语言习得的能力,这些语音信号也就发展成为最初的语言。●语言的产生意味着灿烂多姿的人类文化的诞生,文化和语言可以说是共生的。

语言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文化的发展也促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细密。语言在早期人类的狩猎和采集文化中逐渐发展,日臻完善。到了距今一万多年前,西亚首次出现定居的农业文化。这时

●最近学术界有一种假说,认为猿人的发展经过海猿的阶段。其旁证之一就是人类的语言能力。假说认为,对呼吸的精确控制调节是人类发展语言的基础,没有这种在海猿阶段产生的控制呼吸的能力,人类不可能获得如此复杂的发声方法。

候人类语言已经发展到了接近现代的精微的程度,已知的最早文字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语言和文化的发展虽然是互相促进的,但是语言的型式和文化的型式却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互相制约的必然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型式并不决定于它的语言型式,文化型式的改变并不一定引起语言型式的相应变化,反之亦然;甲、乙两种文化之间和甲、乙两种语言之间可以发生互相影响、融合、替换等关系;但是甲、乙两种文化间的这种关系并不一定会引起语言间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古代日本和朝鲜曾受到过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它们从中国文化中借去大量词汇,但是日语和朝鲜语结构并不因此发生变化。正像现代的日本从英语借入大量外来词,但是日语仍然还是日语。语言的核心是它的语音和语法的结构模式,而不是词汇。再如浙、闽两省的畲族早就改用汉语客家话了,但是历史上依然是长期保留畲族的文化特征。

很难找到文化型式变化引起语言型式相应变化的例子,但是语言型式变化引起文化相应变化却不乏其例。例如皖南在历史上是属于吴语区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来自湖北的大量移民,使皖南某些地方的原有方言湮灭,而代之以湖北话。同时这些地方也因此流行起黄梅戏来。黄梅戏源出鄂东黄梅县,原来以纯粹的湖北话演出,现在却以安庆方言为基础。

语言本来属于文化的范畴,不过在文化现象中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我们把它独立出来,讨论它与文化的关系。但是语言学家一般都是孤立地研究语言本身,而忽略了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探索。到19世纪有些西方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把语言学当作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一些人类学家同时又是语言学家,他们通过种族、语言和文化三个纲目来研究人,认为“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见 Edward Sapir, *Language*, 中译本, 129页)。这种看法革新了语言学的传统研究方法。20世纪以来,西方的学术界普遍地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语言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我国类似的研究开展得较晚。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大致相当于小学,包括音韵、训诂、文字三大部门。“小学”乃是经学的附庸。音韵学推求古音,训诂学考证词源,文字学解释字形,研究的范围限于书面语言,目的只是为了解经。进入20世纪,西方语言科学东渐,才开始脱离乾嘉学派的轨道,扩大研究范围。但是几十年来语言学界的目光还只是集中在描写语言现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构拟古音为主要目的的历史语言学和以研究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为目的的应用语言学上。1950年罗常培先生曾著有《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一书。遗憾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罗著的研究范围包括古今中外的语言和文化,本书缩小研究范围,只讨论中国境内的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着重讨论方言与中国文化史上的种种问题。

第二节 方言和语言的关系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唐代贺知章这首脍炙人口的七绝,描写自己从小离家,垂老才得还乡,人事早已变化,惟有乡音依然如故的情景。乡音就是方言。古今任何语言,除了使用地区很小、使用人口很少的以外,都有方言的地域差异。人们早就观察到方言的存在。《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东汉的王充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见《论衡·自纪篇》)他正确地指出古书难懂的原因是:古今语言有历时的变化,又有共时的方言差异。

西汉扬雄所著《方言》是我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书。扬雄的所谓“方言”是跟所谓“通语”相对而言的,“通语”或称为“通名”、“凡语”、“凡通之语”、“四方之通语”,都指的是通行范围较广的词语。

现代的语言学认为,方言是语言的变体。同属一种语言的方言有共同的历史来源、共同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其现代的形式在语音上必定有互相对应的关系。

方言(dialect)又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大类。地域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一般说来,同一种地域方言集中分布在同一个地区,也有移民把它带来远离故乡的地方的,如流布在海外的粤语和闽南话。这些远离故乡的方言久而久之会演变成新的地域方言。社会方言(sociolect和social dialect)是语言的社会变体,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因职业、阶层、年龄、性别等等不同,口音、措词、言谈也会有差别。例如20世纪初年之前的常州方言有街谈和绅谈的区别。街谈是城里大多数人说话的形式,绅谈则或多或少局限于文人或官吏家庭。(见Chao, Y. R, Changchow Dialec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0, 1, 1970)语言的个人变体叫“个人方言”(idiolect),使用同一种语言或方言的每一个人说话的特点各不相同。个人方言也可以算是社会方言的一种。

本书所谓方言,如果不加特别的说明,都指地域方言。

在有方言差异的社会里,人们开口说话总是用某一种方言。相对于“方言”而言,“语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在口头上使用的是“方言”,而不是“语言”。现代有些社会人为地制定“民族共同语”,人们说话当然可以使用这种民族共同语。但是我们仍不能将所谓“民族共同语”和“民族语言”等同起来。因为民族共同语也是以某一种方言为基础的。例如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人们说话常用普通话。且不管大多数人所说的普通话都是带有方言特征的,就是标准的普通话也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北京话和北方话当然也是方言。我们并不能在普通话和现代

汉语之间划上等号。语言、方言、民族共同语这三者的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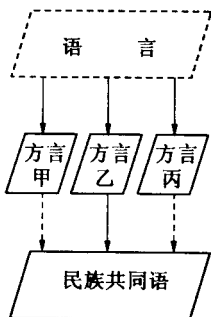


图1

这幅示意图中的“方言乙”是基础方言。“民族共同语”虽以某一种方言为基础,但其中一般都有许多成分是各方言所共有的。所以非基础方言和共同语间也有重合之处(图中用虚线表示)。

中国的大多数语言内部都有方言差异,并且方言现象非常复杂。研究这些方言现象

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是一种引人入胜的事业。这也正是本书取名《方言与中国文化》的主要原因。

第三节 现代中国的语言和方言

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种语言？目前还很难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这是因为我们对其中有些语言的知识还是不完备的，或者没有经过较充分的调查研究；对于划分语言和方言的标准也不甚统一，如果把某些方言当作独立的语言，那么语言的总数就要增加，一般的估计是七八十种。

按国内语言学界的传统看法，这七八十种语言分属五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系。汉藏语系不论从地理分布的辽阔或使用人口的众多来看，都是国内最大的语系，它遍布全国，只是在西北和内蒙的分布比较稀疏。阿尔泰语系分布于从新疆经内蒙到东北的中国北部边陲一带。南亚语系分布于云南省西南部沿边地带。印欧语系分布于新疆西北角。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系，又称南岛语系，分布于台湾省，即高山族的语言。

国内各种语言的系属关系见表1。^①

表 1

一、汉藏语系

汉语	——汉民族共同语，回族、满族、畲族通用汉语
壮侗语族	{ 壮傣语支——壮语、布依语、傣语
	{ 侗水语支——侗语、水语、仫佬语、毛难语、拉珈语
	{ 黎语支——黎语
藏缅语族	{ 藏语支——藏语、羌语、门巴语、珞巴语、嘉绒语
	{ 彝语支——彝语、傣僳语、纳西语、白语、 拉祜语、哈尼语、基诺语
	{ 缅语支——阿昌语、载佻语
	{ 景颇语支——景颇语、独龙语
	{ 语支未定——普米语、怒语、土家语、僜语

① 据张公瑾《谈我国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载《百科知识》1981年第10期，略有增补和变动。

苗瑶语族 { 苗语支——苗语、畲语
瑶语支——瑶语

语族未定——仡佬语

暂归本语系——京语

二、阿尔泰语系

突厥语族 { 西匈语支——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撒拉语、
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
东匈语支——柯尔克孜语、西部裕固语

蒙古语族——蒙古语、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

满·通古斯语族 { 通古斯语支——鄂伦春语、鄂温克语
满语支——满语、锡伯语、赫哲语

暂归本语系——朝鲜语

三、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高山语

四、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崩龙语支佉语、崩龙语、布朗语

五、印欧语系

斯拉夫语族——东斯拉夫语支——俄罗斯语

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塔吉克语

汉语是汉藏语系中最重要的语言,它包括七大方言。^①

1. 官话。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70%以上,分布于整个中国的北部、长江以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以及下列省份沿长江的部分地区: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2. 吴语。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8%,大致分布于上海、苏南、浙江大部分地区及江西与浙江比邻的几个县。皖南的徽州方言和浙西的建德、淳安方言是否归属于吴语还未最后确定。

3. 赣语。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2%强,分布于江西的北部和中部。

4. 客家话。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4%,分布于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福建的西部及台湾的新竹、苗栗等地。赣语和客家话是很接近的,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同一种方言的两大支派。

5. 湘语。传统的看法包括新湘语和老湘语,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5%,分布于湖南洞庭湖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按笔者的意见,新湘语可以划归西南官话。湘语只应指老湘语,分布于湘西南

① 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明文,1988),汉语有十大方言,除本节所述七种外,还有晋语、徽语和平话。

的七八个县,以及与之比邻的广西的四个县。

6. 闽语。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4%强。分布于福建(除闽西客家话区外)、广东东部和海南岛及雷州半岛一部分、台湾大部分地区、浙南与福建比邻的小部分地区。

7. 粤语。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5%,分布于广东大部分地区、广西东南部。

粤语、闽语和客家话在港澳及海外亦有分布。

第四节 汉语方言分化的历史背景

在七大现代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粗略地看成是古汉语数千年来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发展的结果,其余六大方言却是由于历史上北方居民的不断南迁在南方逐步形成的。秦汉以前,广大的江南地带,即所谓“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的地方,主要还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们所使用的古越语跟古汉语的前身相差很远,不能通话。秦汉以后的两千余年,北方的汉人曾有几大规模南下,带来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南方不同的地域,逐渐形成南方相互歧异的六大方言。而且就在同一种方言内部,有的也有很大的差异,如闽语中的莆仙话和闽南话虽然在地理分布上是相邻的,但是它们的使用者必须通过普通话才能畅谈。造成这种歧异的原因显然是:第一,南下之前的北方汉语内部,或与北方汉语接触之前的古越语内部本来就有方言的差异。这从扬雄的《方言》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二,语言是不断发展的,北人南下的时间有先后,他们先后带来的北方话自然也有差别;第三,南方各方言内部独立发展出一些新的成分。

现代汉语七大方言跟古汉语及其前身的关系,以及各方言间亲疏远近的关系,可以用图2示意。在南方六大方言中客家方言和赣方言比较接近,吴语和老湘语比较接近,最早形成的是吴语和老湘语,其次是粤语,再次是闽语,最后是赣语和客家话。北方方言的分

支江淮官话的形成比西南官话要早,新湘语则是西南官话源头与老湘语接触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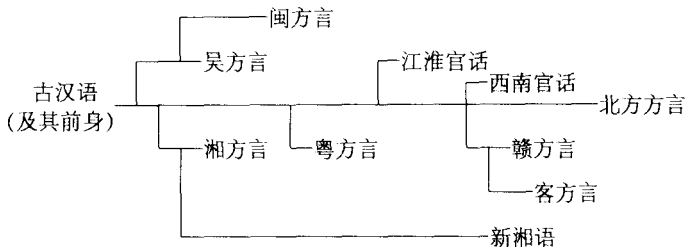


图 2

第五节 汉语方言研究史梗概

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是很悠久的,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一、传统方言学时期

东汉的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辘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密室。及嬴氏之亡,遗弃脱漏,未见之者。”这是说周秦时代的君王常常在秋收农忙之后派使者到民间采录方言俗语,并且登籍珍藏,可惜这些著录并没有传于后世,而且此风汉代以后也已经废止。

虽然在先秦经籍和汉代经师的注解中偶然也可以找到对当时方言的零星记载,但是现存最早的方言学专著应该是汉代扬雄所著的《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距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扬雄(公元前 53—18)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后在天禄阁校书,他通过来自全国各地的孝廉和卫卒,搜集和整理记录当时的口语词汇,整理成这本方言比较词汇集。附在《方言》后边的《答刘歆书》说:“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

于策,二十七岁于今矣。”《方言》在记录口语词汇、比较各地词汇异同、反映汉代方言地理面貌等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曾被誉为“悬之日月而不刊之书”。《方言》是世界上第一本方言词汇集,在欧洲,同类著作迟至18世纪才问世。《方言》的不足之处是:只限于记录部分词汇;缺少对语音的叙述,所谓仅“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见《颜氏家训·音辞篇》),不能反映汉代方言的全貌。晋代郭璞曾为《方言》作注,不仅注释《方言》所录的词语,并且常拿晋代的方言与之比较,因此郭璞注成了研究晋代方言的宝贵资料。

从魏晋至元明,现存的重要的方言学专著除了郭璞《方言注》外,只有元末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周书所描写的是14世纪初北方口语语音。对于了解和研究当时北方的语音系统是极为重要的文献。此外在一些韵书、韵图和笔记杂谈性质的著作中也有些关于方言语音和词汇的记录。如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均已亡佚)、王应麟《困学纪闻》、陶宗仪《辍耕录》等。《广韵》和《集韵》也包含方言成分,而且研究现代方言也离不开这两本韵书,但是这两本韵书的宗旨只是在于订定标准音而不在于研究方音,所以也不能算方言学专著。

清代的考据学非常发达,当时的学者们发现方言俗语可以与古书相印证。于是出现了许多以辑录和考证方言词汇为目的的著作。这些著作可以分成所谓“分类考词派”和“分类考字派”,前者侧重考证词义,如翟灏《通俗编》、钱大昕《恒言录》、范寅《越谚》;后者侧重考证方言本字,如胡文英《吴下方言考》、杨恭铨《客话本字》。

章太炎是传统方言学的最后一位大师,著有《新方言》、《岭外三州语》。他的研究超越于清儒之处是:从音韵演变来考释词语的演变,把方言的音、义结合起来研究,所谓“疑于义者,从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求之”。章太炎同时还是第一位给汉语方言分区的中国学者(见《章太炎文钞》卷二)。限于当时的调查深度和调查材料,章氏的分区,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跟方言事实相距太远。

清儒和章太炎研究方言的目的是以今证古,即以今方言和古籍上的书面语相印证,我们称之为传统方言学。

二、描写方言学时期

到了 20 世纪,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现代的描写方言学诞生了。它强调描写活的语言,揭示语言的内部结构。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特点是描写语音,并且拿它来跟切韵音系比较,寻找从古到今的音变规律。

这阶段是由民间歌谣研究揭开序幕的。为了适应记录歌谣的需要,北京大学在 1924 年 1 月成立了“北京大学方言调查会”。他们发表方言调查宣言书,提倡调查、记录和研究活的语言,设计了一套以国际音标为基础的记音符号,并且用它们标注了十四种方音,作为实例。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 年)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研究方言的经典著作。他初步设计并使用的调查表格及例字,至今一直被方言工作者所沿用。在赵元任、李方桂等人的倡导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有一个时期把全部力量放在方言调查上。他们进行过六次规模颇大的方言调查。根据第六次调查材料写成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 年)是中国第一部有方言地图的著作。三四十年代还曾出版过十来种别的方言学专著,如黄锡凌的《粤音韵汇》、陶燠民的《闽音研究》、罗常培的《厦门音系》、董同龢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等。

第二阶段:从 50 年代开始至 60 年代上半期,研究重点是:描写各地方音,并且拿来跟普通话比较,寻求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规律,主要是为推广普通话服务的。

从 1956 年开始有领导有组织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以县为单位的方言普查,共完成了 1 849 个点的调查,写出了 1 195 种调查报告,但是正式出版的只有《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河北省方言概况》、《安徽方言辨正》、《四川方言音系》等数种。对个别地点也曾做过较深入细致的调查,并且整理成著作发表,如《昌黎方言志》。另有些单篇论文散见于各种刊物。北京大学汉语专业编著的《汉语方言词汇》、《汉语方音字汇》和袁家骅等人编著的《汉语方言概要》